

# 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的影响探究

——基于 CFPS2014 的实证检验

陆杰华, 郭荣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在支持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转和提升老年福祉水平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亦是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有益探索。研究发现子代持有的孝道观念在具备相互性和权威性二元面向的基础上,可进一步被划分为“高认同型”“分化型”“矛盾型”“低认同型”四个潜在类别。“孝道—福祉增进效应”具有稳定性,子代对相互性孝道认同程度越高,其亲代产生高福祉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该效应在亲代群体间具有异质性,拥有养老资源较为匮乏的亲代,能够从孝道对福祉的正向效应中获得更多回报。下一步政策取向是强化新时代家庭观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发挥家风建设和家庭美德发展对实现代际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和高度的责任认同的有效力量。

**关键词:** 孝道类别; 老年福祉水平; 相互性孝道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05(2023)01-0135-12

**DOI:** 10.14134/j.cnki.cn33-4337/c.2023.01.012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是“家教家风”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对家庭建设和强化优秀传统文化依托的高度重视。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传承弘扬家庭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传承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度老龄化这一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新国情,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发挥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这一“软武器”的力量,因其具有正名、导向、监控、强化的功能和长时段的稳定性,不仅反映了亲子间互动原则,而且统摄辈分、年龄与性别阶序,支持家庭养老功能的运作与维持。在2021—2035年我国将从“老龄社会”迈向“超老龄社会”的进程下,要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应始终以提高老年福祉为主旨。科学测量老年福祉水平,既是合理关切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多样诉求的现实要求,也是完善衡量老龄

收稿日期: 2022-12-19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0ZDA32)

作者简介: 陆杰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口学博士,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老年人口学研究;郭荣荣,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

事业发展成效评估指标的应有之义。

理想的老年生活离不开和谐的代际关系,家庭功能的健全运作整合了老年人整体生活福祉。孝道作为中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对家庭整体互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那么是否存在“孝道—福祉增进效应”:一方面,子代所持不同类别的孝道观念对亲代福祉的作用效果如何?另一方面,该效应是否会受到亲代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子代孝道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亲代制度性保障的暂时缺位?由此,本研究首先基于孝道二元模型来明晰孝道内涵,尝试探析子代对各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以辨识孝道潜在类别。其次通过构建亲子匹配数据,探索子代孝道的潜在类别对亲代福祉指数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分析。最后讨论如何有效彰显家庭养老的文化价值,发挥孝道在支持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转和形塑全社会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达成的价值理念统一这两方面的作用。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一) 孝道二元模型及划分孝道类别的相关研究

孝道二元模型由叶光辉、杨国枢等提出,其通过编制孝道测量量表,首次将对孝道的研究从人文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开创了孝道实证研究的先河<sup>[1]</sup>。该模型的理论构思来源,首先通过分析传统经典文本,总结了孝道涵盖的敬爱双亲、顺从双亲、随侍在侧等15项内涵<sup>①</sup>,并以此编制孝道问卷。进一步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将15项内涵提取为尊亲恳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四个因素。后经因子分析进一步将四因素聚合为两个更高阶因素结构,即“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以取代笼统概括的孝道观念,阐释在概念内涵与运作效果上可明显区分的孝道二元特性<sup>[2-3]</sup>。权威性孝道以儒家的“尊尊”原则为运转机制,强调个体应该尊敬、顺从在关系网络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而不在乎处于高位的人如何对待自己,反映了对阶级与权威的顺从及对个体自主性的压抑。在尽孝行为上,子女至少可以显示身体上、财务上和社会上三方面牺牲,尽孝的目的常常与延续家族的生命和文化有关,并受到权威与社会规范的作用。相互性孝道以“报”和“亲亲”两个人际互动原则为运转机制,建立在亲子良好的感情基础上,强调彼此平等的对待,植根于亲子间自然情感互动的心理原型。二者在不同时期受到社会经济和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各有侧重<sup>②</sup>,但在集体层次上均具有约束或抑制子女行为的社会功效,强调子女应对父母和家庭尽责,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对抗性和冲突性关系。

现有基于孝道二元模型来划分孝道类别的研究聚焦于孝道观念的变迁、代际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等,主要呈现出两大鲜明特点。一方面,在分析方法上,多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受测样本对不同孝道观念的认同状况,根据因子载荷结果将提取出的两大公因子命名为权威性和相互性孝道,并基于每个样本在两大公因子上的因子得分,构成后续回归分析中的解释变量<sup>[4-5]</sup>。另一方面,在从动态视角探讨两类孝道观念的变迁趋势上,发现孝道变迁不是简单地全部消解与否,而是在当代社会进行了自适应变迁,例如孝道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孝道的方式趋于理性化和多元化等<sup>[6]</sup>;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始终强于权威性孝道,且随时代发展二元分化特征变得更为明显<sup>[7-8]</sup>。此外,绝大多数孝道观念都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对个体孝道观念认同程度的影响模式亦存在差异<sup>[9]</sup>。

①包括敬爱双亲、顺从双亲、谏亲以理、事亲以礼、继承志业、宣扬亲名、思慕亲情、娱亲以道、使亲无忧、随侍在侧、奉养双亲、爱护自己、为亲留后、葬之以礼、祀之以礼。

②叶光辉通过探究我国台湾地区民众孝道观念的变迁情形,发现权威性孝道的受重视程度大幅降低,且其重要性降低与现代社会变迁中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强调有所关联,故以“变迁孝道观念”因素称之;而相互性孝道的重视程度更高且受到社会变迁相关因素影响程度较低,故以“核心孝道观念”因素称之。

## (二) 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

亲代福祉是亲代个体生活的良好状态,反映了对生命质量和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具有现实性、综合性、动态性<sup>[10]</sup>。现实性强调增进老年福祉应以解决老年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综合性和动态性则要求切实关注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多样诉求。探究不同维度的孝道观念对亲代福祉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探究子代持有的权威性和相互性孝道对亲代福祉的影响,多以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现行政策脉络为背景,并且子代样本选择偏重于青少年<sup>[11]</sup>。例如, YEH 等使用孝道二元测量问卷调查我国台湾地区中学生,发现相互性和权威性两种孝道都能降低亲子冲突,但相互性孝道作用效果更强<sup>[12-13]</sup>。其二,探讨子代孝道二元观念如何影响家庭养老行为,发现权威性孝道观念主要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相互性孝道观念主要影响情感支持<sup>[14]</sup>;而在生活照料方面,两种孝道观念均没有显著影响<sup>[15]</sup>。并且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中应将家庭成员与老年人的互动关系列入评估项目,以提供最贴切的照护资源<sup>[16]</sup>。其三,对福祉水平的测量包括客观测度、主观测度和主客观相结合三种方式,客观福祉侧重亲代各项需求的满足程度,主观福祉则取决于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内心感受与情景体验。亲代福祉水平亦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如选择依赖型养老策略的三孩及以上老人、农村老人与高龄老人对应的老年福祉较高等<sup>[17]</sup>。有研究基于由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p>①</sup>以“养老资本”定义老年群体在进行养老生计选择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并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sup>[18]</sup>,从而现在不同社会人口特征下老年人拥有的养老资本、养老策略及其产生的福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sup>[19]</sup>。

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成果对本研究在明确核心概念内涵、构建测量指标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借鉴作用,但对于探讨子代所持孝道观念类别对亲代福祉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属性群体间的差异性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孝道二元模型的实证研究主要从子代的单独视角出发,例如探讨子女的孝道二元观念对自身行为或对老人刻板印象的影响,就构建亲子匹配数据研究子代孝道对亲代福祉影响的相关议题研究较为欠缺。此外,辨识孝道类别时多选择探索性因子分析,旨在通过抽取公因子使指标之间达成局部独立性,公因子存在于所有测量指标中,只是程度不同。然而,子代对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不只存在水平上的差异,亦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即不同类别的个体间在所有观测指标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别。另一方面,福祉测量多以幸福感、满意度等单一指标代替,并且在探讨子代孝道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暂时缺乏制度性保障的亲代的福祉水平是否有提升作用方面,仍缺乏系统的认知。由是,本研究试图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

##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源于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的成人数据库,该调查旨在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状况,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于2010年正式开展,每两年调查一次,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2014是迄今为止涉及测量孝道观念比较具有全国代表性和相

<sup>①</sup>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个体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和将生计资本选择策略转化为积极的生计结果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方法。在该框架下,个体生计状况主要取决于由体力劳动、知识、技能形成的个体生计能力,由储蓄和资源组成的有形资产,由获得的物质或道德支持组成的无形资产三部分生计资本。生计资本是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和用以增强面对脆弱性条件的风险抵御能力,生计资本经组合形成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而影响具有异质性的生计活动结果。

对时效性的亲子匹配调查数据,研究选取父母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存活且18岁以上成年子代样本,通过构建亲子匹配数据,剔除缺失值和不适用数值后,得到有效样本8798份。问卷中共有6道关于测量子代对各孝道观念认同程度的问题,包括“无论父母对子女如何不好,子女仍应该善待他们”“子女应该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儿子结婚后应该和父母住在一起”“为了传宗接代,人应该至少生一个儿子”“人应该做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子女即使在外工作也应常回家探望父母”(依次对应F1—F6)。测量采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1—5)的升序5点量尺计分。

##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亲代福祉指数,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个人福祉指数”对主观福祉的划分,将其测量指标划分为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对未来信心程度<sup>①</sup>并且经CRITIC客观赋权法将三者合并为单一的福祉指数。生活满意度直接反映了个体对各项民生服务质量的评价及不同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满意程度,是个体对社会事实的心理映射和较为理性的认知判断<sup>[20]</sup>,与福祉具有的“现实性”相对应;幸福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评价,与“综合性”相呼应。“动态性”则要求福祉测量不仅包括个体对当下生存基本需求的满足,而且包含未来自我发展的实现和高层次福祉的提升,故使用对未来的信心程度这一测量指标。解释变量为子代孝道的潜在类别,即通过将子代对6道孝道观念认同程度这一外显变量经过潜在类别分析后,得到的潜类别结果。控制变量借鉴上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涵盖亲代的人口学特征和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成的养老资本。<sup>②</sup>变量具体测量及其分布情况见表1。

## (三) 分析策略

第一,因子代孝道的潜在类别属于难以直接观测的变量,需要借助外显的测量指标来估计。因此基于问卷中“子代对各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这一外显变量,使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对子代所持孝道观念进行分类。LCA通过间断的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变量间的关联,其基本假设是,多个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斥的潜在类别来解释,每种潜在类别对各外显变量的反应概率都有特定的模式或特征向量<sup>[21]</sup>。LCA的估计结果包括潜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前者指各类别占样本的比重,即持各孝道类别的子代人数占子代样本总数的比例;后者是潜类别组内的个体在外显指标上的作答概率,条件概率越大,代表该类别组内的子代对该题项的孝道观念认同程度越高。通过潜在类别分析,不仅能够把握子代对不同维度孝道观念的整体认同程度,而且能够将每一子代个体归入相应的类别中,以明晰各类别的基本特征,便于将其作为前因或结果变量引入进一步的因果关系分析中。相较因子分析,<sup>③</sup>该方法的独特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使得测量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抽象概念成为可能,本研究的孝道观念属于心理反应向度,若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简单加总计算,则易忽视题项之间的差异,使得孝道概念的内涵结构模糊化;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测量样本间结构上的差异,能够保证划分出来的不同孝道类别之间差异最大而类别内部最小。

①根据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在多个福祉指标体系的比较中,学者一致认为“不丹指数”的指标选择依据最为完整;而在国内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个人福祉指数”采用标准化合成福祉指数,将其个体主观福祉水平操作化为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对生活意义评价三个维度。

②控制变量的设置借鉴张若恬、李树茁等研究成果中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于老年福祉议题时对老年资本变量的设置,以及张文宏、裴晓梅、张竞月等研究中对老年社会资本的划分。

③本研究在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以划分孝道类别之前,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子代对6种孝道观念(F1—F6)认同程度的测量结果,提取了分别包含F1项、F6项和包含F2—F5项的两大公因子。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吻合,进一步验证了孝道二元模型,同时根据题项内容和孝道双元的内涵,认为本研究中的公因子1符合对相互性孝道的界定、公因子2符合对权威性孝道的界定。

表1 探究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影响效应的变量测量及其分布情况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数量	标准差/百分比	
被解释变量: 亲代福祉指数		CRITIC 赋权结果: 数值型 指数最低 = 0, 最高 = 1	0.730	0.322	
核心解释变量: 孝道类别潜变量		LCA 潜分类结果: 低认同型 = 0, 矛盾型 = 1, 分化型 = 2, 高认同型 = 3	1.830	0.824	
控制变量: 亲代的人口学特征、养老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人口学特征	性别	男 = 1, 女 = 0	6050	68.77%	
	年龄	数值型: 岁	65.614	11.521	
	婚姻状况	现有配偶 = 1, 无配偶 = 0	4848	55.1%	
	户口状况	非农 = 1, 农业 = 0	2444	27.78%	
物质资本	个人年收入	数值型: 元/年	20500.84	20231.26	
	自评收入地位	较高 = 1, 较低 = 0	0.649	0.477	
人力资本	自评健康	比较健康 = 1, 不健康 = 0	0.518	0.500	
	受教育年限	数值型: 年数	10.112	3.706	
	互联网重要性	重要 = 1, 不重要 = 0	0.463	0.499	
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	评价本县政府	有一定成绩 = 1, 没有成绩或更差 = 0	0.490	0.5
		对邻居信任度	比较信任 = 1, 不信任 = 0	0.648	0.478
	社会支持	自评人缘情况	较好 = 1, 不太好 = 0	0.807	0.395
		自评家庭地位	较高 = 1, 较低 = 0	0.239	0.426
		社会保障问题严重性	较严重 = 1, 不太严重 = 0	0.630	0.483
		享有社会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 = 3, 城镇职工 = 2, 城乡居民 = 1, 没有参加 = 0	1.038	0.583
		医疗总花费	数值型: 元/年	2299.001	8329.966
评价看病点医疗水平	较好 = 1, 不好 = 0	0.336	0.472		

第二,使用 CRITIC 客观权重赋权法来合成单一的亲代福祉指数,以综合反映亲代的福祉状况。该方法是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前提下,以变异性和冲突性两个概念为基础确定指标权重:前项表示同一个指标在各个评价对象之间取值差距的大小,以标准差来表现,值越大即各评价对象之间取值差距越大;后项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如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说明两个指标冲突性较低。权重确定后对各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亲代福祉指数。

第三,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影响亲代福祉水平的孝道类别。将潜类别分析的分类结果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 CRITIC 方法所得的福祉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人口学特征、养老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

## 四、实证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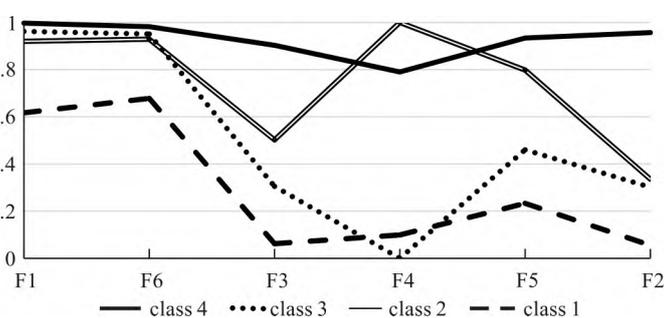
### (一) 划分子代孝道类别和测量亲代福祉指数结果

潜在类别分析以外显变量的观测值即子代对不同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作为分析基础,以旨在识别子代孝道观念的类别特征。潜在类别数量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模型的拟合值指标(AIC、BIC、aBIC)和熵值(Entropy)。表2展示了模型拟合的2—6个潜在类别的统计量,其中AIC、BIC、aBIC的统计量越小、适配度越高;同时熵值表示模型分类正确率与错误率的差异,其指标越大表示分类正确率越高<sup>[22]</sup>。总体来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4类、5类相对较好,但5类中某个分类比例过小且熵值小于4类,因此将子代孝道类别分为四种较为合理。

表2 LCA 潜在类别数量结果:2—6类模型拟合优度

潜在类别个数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	BLRT
2	52918.014	53010.084	52968.772	0.646	0.000	0.000
3	52663.093	52804.739	52741.182	0.560	0.000	0.000
4	52457.602	52648.823	52563.022	0.709	0.008	0.000
5	52339.657	52580.454	52472.408	0.646	0.000	0.000
6	52328.139	52618.513	52488.222	0.646	0.017	0.000

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得到的潜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结果如图1所示,四类别占总样本的比重分别为23.19%、49.94%、19.98%、6.9%(分别对应class 4—class 1)。同时,除类别2的观测值曲线外,其余三条曲线的最高和次高点皆出现在F1项和F6项,该三类群体占比总和达80.05%,说明样本中有八成的子代对F1项和F6项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最高。据测量问卷,该两项包含的“善待父母”和“常回家探望”指涉相互性孝道的两个次级因素“尊亲息亲、奉养祭念”。鉴于该分类结果,结合叶光辉等人将相互性孝道定义为孝道二元模型中的“核心孝道因素”,同时参考曹惟纯等、李启明等、陈滔等实证研究结论<sup>[8][23-24]</sup>,本研究将根据各潜在类别在F1项和F6项上的观测值大小(即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对各潜在类别进行命名。第一,将类别3命名为“分化型”,即相互性高权威性低:因该群体内部在解释相互性孝道的F1项、F6项上的认同程度显著高于解释权威性孝道的F2—F5项,且该曲线的绝对落差值和相对斜率变化皆高于其余三条曲线,说明其所持孝道观念的二元分化程度最高。第二,将类别2命名为“矛盾型”,即权威性高相互性低:该曲线的整体趋势虽依旧保持二元特征,即对相互性孝道的观测值整体高于权威性孝道,但其在F4项上出现异常峰值的情况与剩余三条曲线出现显著差别。F4所测题项为子代对“为了传宗接代,人应该至少生一个儿子”观念的认同程度,类别2群体在该项上的条件概率最高,说明组别内部对该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最高,即不仅高于解释权威性孝道的剩余题项,而且高于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第三,将类别4和类别1分别命名为“高认同型”(双高)和“低认同型”(双低):除“矛盾型”曲线在F4处上的峰值点和“分化型”曲线在F4处的低凹值外,类别4和类别1曲线在6个问题上的观测值皆处于最高/低值,说明在遵循孝道二元特征的基础上,有23.19%的样本(类别4)对6个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皆高于其他类别;有6.9%的样本(类别1)对孝道的认同程度在所有类别中皆最低。

图1 子代孝道观念的潜在类别分析结果<sup>①</sup>

(类别4:高认同型,占比23.19%;类别3:分化型,占比49.94%)

(类别2:矛盾型,占比19.98%;类别1:低认同型,占比6.9%)

<sup>①</sup>图中曲线为LCA分析结果的条件概率曲线,其数值越大代表该类别群体内部对题项测量的孝道观念认同程度越高。例如在F1题项测量子代对“无论父母对子女如何不好,子女仍应该善待他们”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上,类别4群体的认同程度最高,类别3次之,类别1最低。

亲代福祉指数测量指标的赋权结果如表3所示,三个指标的原始测量均值排序为幸福感 > 对未来信心程度 > 生活满意度,说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虽然都是亲代基于评价事实体验的期望与感知即理想与现实的结果,但二者仍存在落差和矛盾,意涵幸福感映射的对福祉水平“综合性”的评价程度高于生活满意度暗含的福祉“现实性”的评价。表中第五列为权重占比,生活满意的权重最高,达36.5%;对未来信心程度次之,为32.83%;幸福感权重最低,为30.67%。由权重和赋权前均值两项的乘积,得出赋权后均值的排序,即对未来信心程度 > 幸福感 > 生活满意度,福祉指数为三者的总和,值为0.73。此结果表明,一方面,与郑方辉等、余碧莹等的实证分析成果较为一致<sup>[20][25]</sup>,即公众的主观幸福感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其不仅与传统文化中的“大统一”文化、长期以来的“报喜不报忧”舆论导向、社会转型中的“搭便车”心理本能和“中庸思想”有关,而且是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强烈反映。另一方面,杜鹃等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心理社会模式视角下被接受得最为广泛的有关成功老龄化内涵的界定,其与个体的抑郁症状、自杀倾向等心理状况高度相关<sup>[26]</sup>。

表3 亲代福祉指数测量指标的赋权结果

福祉指数测量指标	指标变异性	指标冲突性	信息量	权重	赋权前均值	赋权后均值
生活满意度	0.488	1.317	0.642696	36.50%	0.611	0.223
幸福感	0.386	1.399	0.540014	30.67%	0.818	0.251
对未来信心程度	0.414	1.396	0.577944	32.83%	0.780	0.256

注:(1)福祉指数计算:将赋权后的三项均值相加,结果为0.73;(2)三个测量指标的定义赋值为:生活满意度高/幸福感高/对未来有信心=1,满意度低/幸福感低/对未来没有信心=0。

## (二) “孝道—福祉增进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指数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1结果显示,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产生了0.1%水平上的正向效应。

全样本回归模型5显示,其一,整体来说,孝道双元面向中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高于权威性孝道;同时,“孝道—福祉增进效应”具有稳定性,即与双低类的低认同型子代相比,矛盾型、分化型、高认同型子代对相互性孝道认同程度更高,<sup>①</sup>其亲代产生高福祉指数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在于,以相互性孝道为核心要素的孝道观念强调亲子间的责任认同与情感联结,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高认同性,通过全面增强其对亲代的赡养行为和与亲代达成合作互助的理性策略,在家庭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利益攸关机制,进而保障和巩固了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促进代际关系质量的提升,以增进亲代福祉。该模式是由费孝通提出,用来描述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鲜明特点,<sup>②</sup>基础是均衡互惠,代际间的来往给予和需求互补增进了家庭的凝聚力,亦为家庭养老模式的持续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互性孝道对反馈模式的巩固作用,体现在子代全面增强了对亲代的赡养行为,从而自发、自然、自觉地履行赡养义务并且对亲代产生精神抚慰和价值认同效用。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吻合。例如,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高度认同和对家庭价值的追求,有助于亲子间日常的生活互助和情感交流,进而促进代际间的团结<sup>[27]</sup>;“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观念和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子代善待父母的核心孝道观念受到高度肯定,孝道观念整体呈现的是“重孝”局面,且养亲观念更强、赡养观念更理想化<sup>[28]</sup>。

其二,矛盾型孝道类别对福祉水平产生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大。这说明,一方面,在强调孝道双元面

①因相互性孝道对划分孝道类别起到决定性作用,即赋值为0的“低认同型”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最低,其他三类别的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均高于参照组。

②区别于西方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的遵循代间均衡的“接力模式”,中国的代际关系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并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的遵循代内均衡的“反馈模式”,二者的差别即在于前者不存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向的同时,亦应注意到部分子代群体在孝道观念上表现出的普遍矛盾性和隐蔽性,准确识别其心理运作机制能够丰富对孝道多维内涵的理解。对持有矛盾型孝道观念的子代群体而言,其矛盾心理体现为责任和独立两方面。“责任”意涵个体从小受到“子女对父母尽孝”这种强有力的规范的社会化,使子代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和受其绝对支配是发源于内的天性使然。“独立”意涵伴以亲代教养方式从“以权威方式训练子女盲目服从”到“以平等和理喻为基础教导孩子善待他人”的转变,使得子代自觉自愿供养、关心、感激父母。另一方面,二元融合的孝道矛盾特性符合亲代对家庭养老功能需求的“理性标准”。<sup>①</sup>随着老年人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调,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倡导快乐主义,“为子女无限操劳”“与子女同住”等已不再是为父母养老的理想。例如,根据“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1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当代农村老年父母均倾向于追求独立性,减少依赖成年子女,老年夫妻多以相互陪伴及照料为主<sup>[29]</sup>。同时,随着老年人生活来源中制度性保障比例的不断提高和老龄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家庭具有的养老功能逐步外化,降低了亲代对子代具有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障效用等需求程度。因此,代际关系不再束缚和僵化在子代对亲代的绝对顺从和毫无条件的牺牲自我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单向的给予而忽视亲代的需要。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高认同性,亦包含在孝道多元维度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当中,如表4所示。

表4 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影响的逐步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孝道类别潜变量(以低认同型为参照组)	1(矛盾型)	0.193***	0.222***	0.206***	0.203***	0.147***
	2(分化型)	0.169***	0.169***	0.164***	0.149***	0.123***
	3(高认同性)	0.134***	0.152***	0.144***	0.137***	0.105***
控制变量——亲代的人口学特征、养老资本(物质、人力、社会)						
人口学特征	性别		-0.023**	-0.025***	-0.029***	-0.027***
	年龄		-0.292***	-0.249***	-0.133***	-0.186***
	婚姻状况		0.065***	0.069***	0.075***	0.082***
	户口状况		0.031***	0.031***	0.005	0.015*
物质资本	个人年收入			-0.007*	-0.01***	-0.009**
	自评收入地位			0.15***	0.137***	0.092***
人力资本	自评健康				0.113***	0.085***
	受教育年限				0.009***	0.006***
	互联网重要性				0.023**	0.014*
社会资本	评价本县政府					0.04***
	对邻居信任度					0.057***
	自评人缘情况					0.174***
	自评家庭地位					0.134***
	社会保障问题严重性					0.003
	享有社会医疗保险					0.019***
	医疗总花费					-0.003
评价看病点医疗水平					0.04***	
_cons		0.574	1.66	1.472	0.912	0.97
Adj R-squared		0.021	0.05	0.098	0.137	0.25

注:表中数字为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在5%、1%、0.1%水平下显著。

①姚远提出衡量家庭养老功能有两个标准:一是家庭所能提供的资源数量,即站在家庭支持角度的“工具标准”,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家庭养老;二是老年人所需要的资源数量,即站在老年人需求角度的“理性标准”,在维系现代社会家庭养老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并没有通过进一步的统计手段对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进行控制,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其一,被解释变量为子代孝道类别,对个体而言孝道观念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倾向。价值观和规范是通过早期社会化获得的,短时间内除非经历了剧烈的生活境遇变化,否则难以轻易改变。其二,亲代主观福祉和子代持有的孝道类别代表了不同的心理特质,对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代表了某种集体性价值,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则是更具个体化的倾向。其三,若必须处理潜在的混淆变量,则需要找到在时间上先于孝道观念形成的变量,而后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分析。然而,CFPS2014 并没有提供该类型的混淆变量,并且无法确切得知子代何时塑造其孝道。综合上述考量,潜在的样本选择问题或无必要处理、或无法直接处理。

### (三) 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目的之二是探讨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因为亲代在个体、家庭及社会养老资源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子代孝道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亲代制度性保障的暂时缺位,以此思考家庭养老功能与社会保障制度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异质性分析时选择控制变量中既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亲代拥有的养老资源差异,又具有政策实施价值能够予以改善的五个变量。

根据表5、表6的数据显示,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水平的正向影响效应整体具有稳定性,并且因亲代个体特征的不同和家庭地位、制度性保障程度的分化而存在异质性。其一,在个体特征上,“孝道—福祉增进效应”对年收入较低亲代的作用力度更大,体现为对该群体的影响系数(0.153)大于较高收入群体(0.135)。其二,在自评家庭社会地位上,自评家庭在本地社会地位较低的亲代,其子代孝道产生的对福祉具有显著增进效果的可能性更高。其三,在医疗保障上,对看病点医疗服务水平评价低、享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较低的亲代,子代孝道对提升其福祉水平的作用力度强于高评价、高保障的亲代。“孝道—福祉增进效应”在亲代群体间的异质性,反映了个人年收入和家庭社会地位较低、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亲代,更加倚重子代孝道发挥的对自身福祉水平的提升功能,亦能够在相互性孝道产生的正向效应上获益更多。该群体整体具有社会资源较为匮乏和养老支持力度亟待强化的突出特点,而其相比于拥有社会支持和养老资源丰富的优势群体,从孝道对福祉的提升效应中获得更多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相互孝道为核心的子代孝道观念对弥补制度性养老保障不足的积极作用,从而能够有效规避因养老服务社会化导致的过度强调工具理性的风险,以及制定养老服务政策过程中对家庭这一隐形要素的忽略。该结果与现有研究相呼应,即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及服务仅仅是满足了成员的衣、食、住、行、生活照料等最低层次的生理性需求,而家庭恰好能够形成成员间的常态化互动,对于社会交往及情感体验等更高层次需求起到了更好的补充与衔接作用<sup>[30]</sup>。

表5 异质性分析——亲代的个体特征、家庭地位差异

		自评健康		个人年收入		自评家庭地位	
		不健康	健康	较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孝道类别 (以低认同型0为参照组)	1(矛盾型)	0.156***	0.135***	0.153***	0.135***	0.153***	0.075**
	2(分化型)	0.122***	0.121***	0.128***	0.108***	0.135***	0.03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表中数字为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在5%、1%、0.1%水平下显著。

表6 异质性分析——亲代的制度性保障差异

		享有社会医疗保险				评价看病点医疗水平	
		无	城乡居民	城镇职工	公费医疗	低	高
孝道类别 (以低认同型0为参照组)	1(矛盾型)	0.222***	0.151***	0.085*	0.122	0.147***	0.146***
	2(分化型)	0.177***	0.13***	0.064*	0.019	0.118***	0.13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注:表中数字为回归系数;\*、\*\*、\*\*\*分别表示在5%、1%、0.1%水平下显著。

##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子代持有的孝道观念类别在相互性和权威性二元面向的基础上亦具有多元矛盾性。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高于权威性孝道;根据“子代对各孝道观念的认同程度”这一外显变量,孝道观念被划分为“高认同型”“分化型”“矛盾型”“低认同型”四个类别,占比分别为23.19%、49.94%、19.98%、6.9%。

第二,“孝道—福祉增进效应”具有稳定性。与低认同型子代相比,矛盾型、分化型、高认同型子代对相互性孝道认同程度更高,其亲代产生高福祉指数的可能性更大,尤以矛盾型类别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大。这与以往有关孝道实证研究结论相互印证,即孝道观念整体呈现的是“重孝”局面,子代善事父母的核心孝道观念受到高度肯定,尤以对父母情感支持的赡养行为增强最为明显<sup>[7][28]</sup>。

第三,“孝道—福祉增进效应”在亲代群体间具有异质性。拥有养老资源较为匮乏的亲代,能够从孝道对福祉的正向效应中获得更多回报,即以相互性孝道为核心的孝道类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亲代制度性保障的暂时缺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王增文、郭庆旺等人的研究<sup>[30-31]</sup>,即家庭能够促进成员间的常态化互动,强调家庭内部成员行为互助的传统文化信念对于满足亲代的社会交往及情感体验等更高层次需求,起到了更好的补充与衔接作用。

由此思量,家庭与其他社会组织最本质的不同是,其成员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联系。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家不是一个冰冷的概念,而是一种融入血液的温度。“花家里的钱”和“花国家的钱”对老年人而言有截然不同的含义,更何况老年人通过家庭获得情感和心灵的满足是任何社会服务都无法取代的。被注入平等互动、合作互益、亲密联结血液的以相互性孝道为核心要素的孝道观念,维持和巩固了代际间的责任认定和情感认同,亦决定了子代能够自觉履行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本研究对“孝道—福祉增进效应”的探索回应了“文化依托对巩固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和维持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作用表现为何”这一问题,即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家庭伦理观,体现了个体的生存观念和形塑家庭内外的交往方式,亦将成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发现蕴含的政策价值意为:提升子代对相互性孝道的认同程度,发挥家风建设和家庭美德发展对实现代际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和高度的责任认同的有效作用。2021年3月《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提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风气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sup>[32]</sup>。具体措施表现在:一方面,加大对优秀家风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在学术研究层面鼓励学界对家训家风文化的科学研究,并予以项目规划、人才引进、经费预算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成立家风文化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举办学术研讨会或系列讲堂,为家风建设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涵盖孝老敬亲优秀家风文化的宣传力度,营造有利于培育新时代家庭观和弘扬家庭孝亲敬老传统美德的生活情境与社会氛围。宣传载体上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有效结合,宣传空间上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促进,宣传方式上开展理论宣讲与实践活动相得益彰,以增强对优良家风和传统美德的认知认同<sup>[33]</sup>。

### 参考文献:

- [1]杜鹏,曲嘉瑶.中国老年人对子女孝顺评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3(5):30-41.
- [2]叶光辉.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9(32):101-148.
- [3]傅绪荣,汪风炎,陈翔,等.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16(2):293-304.
- [4]胡安宁.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J].中国社会科学,2017(3):77-95.

- [5] 郝明松,于苓苓. 二元孝道观念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06东亚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 青年研究, 2015(3): 66-75.
- [6] 钟涨宝,李飞,冯华超. “衰落”还是“未衰落”? 孝道在当代社会的自适应变迁[J]. 学习与实践, 2017(11): 89-97.
- [7] 袁佳黎,刘飞,张文宏. 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 2006—2017[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1): 93-103.
- [8] 曹惟纯,叶光辉. 高龄化下的代间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2011)[J]. 社会学研究, 2014(2): 116-144.
- [9] 李启明. 社会转型背景下孝道观念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3): 23-31.
- [10] 范如国,张宏娟. 民生福祉评价模型及增进策略——基于信度、结构效度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J]. 经济管理, 2012(9): 161-169.
- [11] LI X W, ZOU H, LIU Y, et al. The Relationship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Filial Piety to Adolescents' Family Functioning in China's Mainland[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4, 23(1): 412-436.
- [12] YE H K H, BEDFORD O. Filial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4, 39(2): 132-144.
- [13] YE H K H, BEDFORD O.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6(7): 215-228.
- [14] 许琪. 孝道观念与赡养行为的变迁[J]. 社会发展研究, 2022(1): 176-195.
- [15] CHERR K E, ALLE P D, JACHSON E M, et al. Knowledge of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Memory Aging i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Workers, and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10, 36(9): 81-297.
- [16] 叶光辉,曹惟纯. 从华人文化脉络反思台湾高龄社会下的老人福祉[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30-46.
- [17] 檀学文,吴国宝. 福祉测量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加速城镇化背景下福祉测量及其政策应用”国际论坛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9): 87-96.
- [18] 张若恬,张丹,李树苗. 当代中国老年人养老资本、策略与福祉——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72-83.
- [19] 张若恬,张丹,李树苗. 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对养老资本的影响及城乡差异——基于CLASS 2014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20(4): 68-83.
- [20] 郑方辉,卢扬帆,覃雷. 公众幸福指数: 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2): 68-82.
- [21] 王梦成,毕向阳.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进阶篇[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 [22] NYLUND K L, ASPAROUHOV T, MUTHEN B O. Deciding on the Number of Classes in Latent Class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J].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007, 14(4): 535-569.
- [23] 李启明,陈志霞. 孝道观念及行为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襄阳市的亲子配对调查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6): 69-75.
- [24] 陈滔,卿石松. 中国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J]. 人口与经济, 2019(2): 55-67.
- [25] 余碧莹,赵利婧,胡林,等. 基于时间利用视角的民生福祉改善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72-81.
- [26] 杜鹏,汪斌.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J]. 人口研究, 2020(4): 3-17.
- [27] 韦宏耀,钟涨宝. 二元孝道、家庭价值观与子女赡养行为——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方人口, 2015(5): 52-63.
- [28] 刘汶蓉. 孝道衰落?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 青年研究, 2012(2): 22-32.
- [29] 王萍,王静,连亚伟,等. 农村老年父母家庭养老福祉,孰优孰劣? ——15年家庭结构变动的追踪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9(1): 67-79.
- [30] 王增文. 社会保障家庭要素融入及政策的演进考量[J]. 东岳论丛, 2020(2): 64-73.
- [31] 郭庆旺,贾俊雪,赵志耘. 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J]. 经济研究, 2007(8): 58-72.

- [32] 习近平. 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EB/OL]. (2021-03-28) [2023-03-08]. <https://www.12371.cn/special/xxzd/dzs/jjff/>.
- [33] 刘先春, 柳宝军. 家训家风: 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与有效载体[J]. 思想教育研究, 2016(1): 30-34.
- [34]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EB/OL]. (1992-10-01) [2023-03-08]. <https://www.ids.ac.uk/publications/sustainable-rural-livelihoods-practical-concepts-for-the-21st-century/>.
- [35]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4): 23-35.
- [36] 裴晓梅, 王浩伟, 罗昊. 社会资本与晚年健康——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实证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17-24.
- [37] 张竞月, 许世存. 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21(2): 74-85.
- [38]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7-16.
- [39] 姚远. 稳定低生育水平与中国家庭养老关系的再思考[J]. 人口学刊, 2000(4): 23-26.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ategories of Offspring Filial Piety on Parental Welfare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FPS Data of 2014

LU Jiehua, GUO Rong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upporting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pension security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It is also an active exploration to effectively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and strengthen the family construc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report of 20<sup>th</sup>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ilial piety held by the offspring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high identification type”, “differentiation type”, “contradiction type” and “low identification type” on the basis of the dual orientation of “Reciprocity Filial Piety”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The “filial piety-welfare promotion effect” is stable. When the degree of identity of offspring Reciprocity Filial Piety is higher, the parental welfare is better. And the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among the parental groups. Parents with less elderly care resources can benefit more from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lial piety on welfare. Later policy orientation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family values in the New Era, and further exert the effective fo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virtues to realize the close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high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identity between generations.

**Key words:** latent categories of offspring filial piety; parental welfare; filial piety reciprocity



(责任编辑 张伟)